

红色宝库 奋斗百年

三千孤儿入内蒙始末



1960年内蒙古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与农牧民座谈。

1959年末，新中国面临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全国粮食供应严重短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政府收养的几千名孤儿因为粮食不足，面临营养不良的威胁。

这些幼小的孩子该怎么办？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非常着急，专门请示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想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委主任的乌兰夫，希望乌兰夫从内蒙古自治区调一些奶粉。

当时，乌兰夫还兼任内蒙古自治区主要负责人。虽然内蒙古畜牧业遭受了特大灾害，农牧民生活也比较困难，但考虑到全局工作和民族团结，乌兰夫当即表态说：“总理，这些问题能够解决，但是解决完了，孩子们还不是依然没有吃的、没有家？况且现在孤儿院、保育院已经负担很重了，我必须给孩子们找个家，让牧民们抚养孩子，只要有草原，就有他们的吃的，就有他们的家。”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高兴地说：“这

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牧民又很喜欢小孩，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南方的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还有好处。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乌兰夫主持召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各盟市、各有关部门做好准备工作，包括衣、食、住以及医疗保障人员等。

1960年5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内蒙古卫生厅党组《关于1960年收容并儿童工作的具体计划》作出批复并强调：“希望你们迅速具体把这一工作抓起来，一定要做到收一个，活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自1960到1963年，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孤儿。这些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的也只有7岁，大多数面黄肌瘦，有些还在患病。党组织安排工作人员把年龄大一点、身体好一些的孤儿直接送到牧区去，年幼患病的孤

儿则在呼和浩特、集宁、锡林浩特和包头等地设立了育婴院，对他们进行治疗，待这些病儿恢复健康以后再送到牧区。

当时的内蒙古，虽然也经受过困难时期的严峻考验，但内蒙古各族群众主动担起这份国家责任。年迈的老母亲、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着马，有的赶着勒勒车，有的长途跋涉，争先恐后前来收养这些孤儿。牧民们非常喜欢这些孩子，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给他们取了好听的名字——国秀梅、党育宝、格日勒、娜仁花……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精心照料，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喂养他们，教他们唱歌、跳舞、骑马、打猎，供他们上学读书。这些孤儿在内蒙古各族群众的哺育下，一个个健康地成长。

当时，为了更好地保障幼儿的健康和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的育婴院招收和训练了一批保育员，她们主要是一群具有一定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青壮年妇女。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成了

孩子的“额吉”（母亲），她们尽职尽责、全心全意地照顾着孩子们。都贵玛就是其中一员。

1961年，年仅19岁的乌兰察布盟（现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都贵玛被分配到四子王旗保健站，抚养旗里刚刚接收的28名“国家的孩子”。都贵玛用温柔的爱和宽广的胸怀，给了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从喂奶喂饭到卫生护理，她常常不眠不休；孩子生病了，她冒着凛冽寒风和被草原饿狼围堵的危险，深夜骑马奔波几十里去找医生。在她的悉心照料下，28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在那个缺医少药、经常挨饿的年月，堪称奇迹。就这样，“草原额吉”用自己的大爱，践行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

光阴如水，岁月如歌。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如今都事业有成、儿女相伴，而草原“额吉”们在岁月长河中渐渐老去，但“额吉”们的恩情孩子们永记心间、没齿难忘。这段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流淌着民族大爱的共和国往事，也一直在流传。2019年9月，自己没有儿女、却养育了28名“国家的孩子”的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她的颁奖词是：“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代表，用半个世纪的真情感，诠释了人间大爱。”都贵玛说：“内蒙古的母亲们抚养了‘国家的孩子’，这是历史的丰碑，也是促进民族团结、共患难的一段历史。”

对这一段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21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创造了“齐心协力建包钢”“三千孤儿入内蒙”等历史佳话。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用好这些红色资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重点学习党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特别是要在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维护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重大问题上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

（据统战新语）

这是一张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纸片，装饰着青绿色花纹，印有“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股份总额壹万股”“每股金额人民币伍拾圆整”字样。

这张小纸片，出现在中国证券博物馆的第一个展柜中。文字说明透露它的“特殊身份”——“1984年11月14日，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发行。该股票没有期限限制，不能退股，可以流通转让。”

小纸片讲述中国资本市场风雨历程

比邻的展柜里有一份1984年11月15日的《新民晚报》，泛黄的报纸上有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报道，题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8日开业 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股票发行。”中国证券博物馆副馆长金星说，这种被昵称为“小飞乐”的纸片问世之初就受到了青睐，博物馆特意用一组真人大小的雕塑，再现了当年股民在新中国首个证券营业部柜台前抢购股票的情形。

纽约证券交易所，也珍藏着一张一模一样的编号不同的“小飞乐”股票。1986年11月，邓小平会见时任纽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森，将它作为礼物回赠给远道而来的客人，向国际社会表明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也给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股份制改革以肯定和信心。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黄浦江畔的浦江饭店鸣锣开市。这张纸片所代表的飞乐音响，和另外7只股票一道登上中国资本市场的航船。

当年的上交所，市值仅有12.34亿元。从“全世界最小的股市”，到亚太地区最活跃的新兴市场，再到跻身全球股市“第一方阵”，中国只用了短短30年。

截至2021年5月21日，沪深两市拥有上市公司4326家，总市值超过81.4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球第二大股票现货市场。前行足音铿锵。2005年4月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让A股迎来“全流通时代”；2010年4月沪深300股指期货亮相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为中国场内金融衍生品“破冰”；在QFII和RQFII制度探索跨境投资的基础上，2014年11月和2016年12月沪深港通相继开闸，为全球资本投资A股市场架起更通畅的“桥梁”……

30年前，成立不久的上交所着手探索世界领先的无纸化交易，并开始逐步回收纸质股票。中国证券博物馆的那张“小飞乐”，正是当年被回收的“老八股”股票之一。

2018年12月，中国证券博物馆在原先交易所旧址浦江饭店亮相，“小飞乐”股票是重要展品之一。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张纸片，承载新的职能：向世人讲述新中国资本市场风雨兼程的发展之路。

（据新华社）

拾遗

杨绛的“不装样儿”

1926年，杨绛正在上高中，当时她还叫杨季康，学校在暑假期间举办了“平民学社”讲学，老师要求她做记录。杨绛以为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就满口答应了，到了现场才发现，自己被安排上台记录。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不仅要上台做记录，还要跟那些元老级别的老师同台记录。面对台下乌压压的人群她是又紧张又害怕又羞愧。

等她好不容易调整好心态准备记录，却发现听不懂主讲人章太炎说的杭州官话，这可是致命的问题。作为一个记录员听不懂主讲者说什么，只知道章太炎谈的是掌故，但说的是什么人何事，她完全听不懂，也不知从何处记。要不假装在仔细记录？装也得装得像吧！要不乱写？可写好交卷怎么交代呢？要不画圈画点，画杠杠，可万一给人识破岂不是更糟？此时的杨绛非常尴尬，恨不得演讲赶快结束，她好溜之大吉。但是她不能，只能硬着头皮坐在那里。

杨绛考虑了很久，决定放下笔，静下心来听章太炎讲课。即便如此，她还是听不懂一句，只好眼睁睁看着章太炎。而章太炎在侃侃而谈的同时，也频频回头看那个一字不写的记录员。就这样一直挨到结束，杨绛交了份空白的笔记就走了。虽然暂时摆脱了尴尬，却摆脱不了媒体的报道。第二天，杨绛就上了报纸，报上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不出杨绛所料，等到开学，同学们把这个新闻当作笑料大肆调侃。老师也无奈地对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吗？”其实，老师让杨绛做记录，只是走个形式，没有指望她能记录什么。

但这就是杨绛的性格，知之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装腔作势、不弄虚作假，大大方方做人。（据《人民政协报》）

来自延安保育院的《丢手绢》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他，快点快点捉住他……”

这是一段自带“背景音乐”的文字，您看到时是不是也会轻轻哼唱？《丢手绢》，几乎是中国流传最广的儿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诞生于70多年前的延安保育院。

1935年至1948年，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北战斗生活了13个春秋。那时的延安，是烽火硝烟中的革命圣地，澎湃的革命激情之中，也流淌着《丢手绢》这样的童真和欢乐。

这是革命年代延安娃的童年欢乐，延安保育院就是他们成长的摇篮。

延安保育院是当时设立在延安的儿童保育院、托儿所的统称。据不完全统计，延安保育院在10余年间养育了5000多名孩子，大多数都成长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天毛毛（蒙蒙）亮，这一长列五十孔石窑洞的大院落，就显得十分喧闹——孩子们醒来了。刚敲过起床钟，阿姨们都赶来给他们穿衣服。当阿姨们接近床边时，她们应接不暇地握着很多的小手——在我们这里，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保育员鲍倪这样记录第一保育院的清晨，字里行间流露着温暖和欢快。这样“萌化了”的场景，正是保育院的日常。

文章发表在1945年4月4日的《解放日报》上，标题是“一切为了孩子”。从第一保育院到中央托儿所，到第二保育院，都把这句话奉为誓言、信仰，也真的把这句话变成了每一天的每一件事。

鲍倪就是儿歌《丢手绢》的词作者。她1939年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保育员中，鲍倪文化水平较高，当上了第一保育院的文化教员和保教科长。

丢手绢就是那时孩子们常玩的游戏，但是还没有儿歌，一般是阿姨带着孩子们拍手。能歌善舞的鲍倪就编了几句简明、童真的歌词，伴着节奏唱出来。孩子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来。

孩子们的歌声偶然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甚为有趣，给《丢手绢》谱了曲，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从此，《丢手绢》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据《学习时报》）

假如百年前开一场“冬奥会”

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冰上体育之城”。在清代，一到冬天，无论宫里宫外，无论官宦百姓，满四九城的人们都要热火朝天地在冰雪中一展雄姿。假如那时开一场“冬奥会”，应该也会是项目繁多，异彩纷呈。

花样滑冰与长距离速滑

满族入主中原之前，活动范围主要在黑龙江三省的高寒地带，为了适应气候，建立了一支善于冰上作战的特种部队“八旗冰鞋营”。建立大清王朝以后，清政府为了保持战斗力，推崇尚武的精神，因此将关外盛行的各种冰雪运动引入关内，并以丰富、推广和提倡。清政府规定，每岁十月，咨取八旗及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处，每旗照定数各挑选善走冰者二百名，内务府预备冰鞋、行头、弓箭、球架等项，到了冬至以后，就选取时间，皇帝会驾临瀛台等处，被选中的官兵则按照八旗各色的次序依次走冰较射，场面十分壮观。

所谓走冰，就是滑冰，不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溜冰。据曾经在清末担任步兵统领衙门员外郎的寿逸厂先生回忆，他奉命在三海驻守时，亲眼见过清廷演溜冰之技的场景。“以前宫内曾设有冰鞋处，经办溜冰的相关事宜”，光绪中叶，由于慈禧太后不时住在三海，因此特重冰上赛事，命令神机营选拔万字队旗兵练习溜冰技艺，“慈禧阅看时，预先在冰上用白灰摆成万字不到头花纹及‘太平天下’等字，演习时，持五色旗鱼贯而行，字画显然”。有时这样的溜冰演习也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举办，昆明湖比三海要大，所以演习也比在三海时更有气势。慈禧登高排云殿，一览无遗。直到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海冰场常常可见一位银须清瘦的老人，他是正白旗第三参领第二佐领的护军，名叫吴桐轩，是当年曾经慈禧寓目过的万字队旗兵中硕果仅存的一人，当时他已经年过七旬，但精力和体力不输三十岁的青壮年，每到冬天朔风寒凛之时，他就会穿上八旗兵护军的制服，足蹬冰鞋，在北海的冰面上大展威风，十分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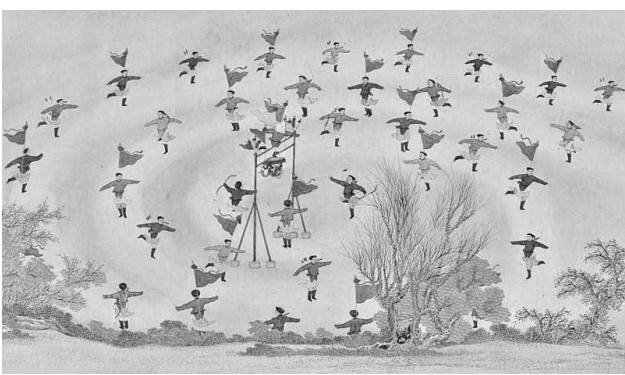
至于民间的溜冰，有一条当时人人皆知的“专用通道”，即清晨动身，由朝阳门起码，顺着结了厚厚冰层的通惠河河道一直往东，过了二闸直下通州，到商店买来通州特产的酱豆腐和大顺斋的糖火烧，然后把糖火烧塞在怀里，提溜着装酱豆腐的罐子，沿来路返回，往返路程约九十里。这一趟长途溜冰蒙不了事，原因是通州产的酱豆腐为凭证——当时通州的酱豆腐不仅块儿大，而且颜色和质地都与北京城产的有差别，一眼即可认出。后来也有人，说老北京的滑冰，宫内是花样滑冰，而民间大约就可比拟做长距离的速滑了。

沿河处处有冰床

说起晚清的第二项冰上运动，大概就是冰床了，也叫拖床。《北京岁时记》上记载：“冬至后，水泽腹坚，都内外之什刹海、护城河、二闸等处，皆有拖床，长约五尺、广三尺，以木为之，下着条铁，一人拖之以跑行，甚速。”这样一旦滑到一定的速度，牵引者会以一个纵身回跃到冰床上，借着惯性，冰床会向前高速滑行很长时间，等到速度慢下来，牵引者又跳下冰车继续拖行，这样循环往复地拖引前行，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耐性和协调性，还可以使身体适应寒冷的气候，少生病少感冒，更有置身水晶宫的快意，因此深受群众的喜爱。

除了个人运动之外，明清两朝到民国初年，在大小海子和护城河上，还存在着以冰车作为交通工具，载客运行的生意。这是因为京城太大而交通不便，长途跋涉实在辛苦，春夏等季尚可骑驴，入冬，反而是乘坐冰床行走于四通八达的水道上，又方便又快捷。通常是把草垫子或棉褥子铺在冰床上，牵引者身穿老羊皮袄，站在岸边招揽乘客。冰床有大有小，小到两三人的座位，大的也不会超过四五人，等到“座儿满了”，就拖着冰床往前走，到地儿之前乘客打声招呼，牵引者就会及时停下，这一点特别像十几年前红红时火的小公费。嘉庆诗人得硕亭有竹枝词曰：“一番风雪一番凉，徒步行人渐履霜。诗思不须驴子背，沿河处处有冰床。”道的就是这个景象。

跟民间的冰床比起来，宫廷的冰床要奢华得多。早在明代，宫内就已经出现冰床。《明官史》上说“以木做平板，上加交床，一人在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上如飞”。到了清代，照例皇帝于正月初一上午由北海白塔山的北侧乘冰床滑行到北海北岸的佛寺中拈香拜佛，因此冰床得以不断推广，就像《燕京岁时记》上所述：“太液池之五龙亭前，中海之水云榭前，寒冬冰冻，以木坐床，下镶钢条，一人在前引绳，行冰如飞，积雪残云，景更如画。”慈禧太后不仅喜欢乘坐冰床，还将此作为恩典，赐予王大臣赏坐，上覆车篷，可避风雪。



（清）姚文瀚绘《紫光阁赐宴图》卷。



（清）弘历绘《瀛台胜景图》卷。

抢冰球与高山滑雪

清代的都门冰嬉，还有一项现代人不可想象的运动，即“冰球”，但这冰球不是“打”而是“抢”，而且主要在宫廷内进行。为了保证队员们在冰上不至于摔倒受伤，他们所穿的鞋都是特制的“皆为缺齿，行冰上不滑也”。

除了冰球，还有冰上射箭，当然这项运动也是由宫廷举办。《清朝文献通考》记载：“走队时，按八旗之色，以一人执小旗前导，二人执弓矢随于后。凡执旗者一二十人，执弓矢者倍之，盘旋曲折行冰上。远望之，蜿蜒如龙。”在御座不远的地方设置一道旗门。旗门上悬挂一球，名曰天球，下置一球，名曰地球。“转龙之队疾趋至，一射天球，一射地球，中者赏。”

十分有趣的是，在当时还有一种类似“高山滑雪”的运动，名曰“打滑挞”，由于十分惊险，围观者往往屏息静气，并对成功者和失败者都给予喝彩。

当然，“打滑挞”也属禁中之戏，而在民间，极为流行一种冰上蹴鞠的游戏。这项运动一般多从当年的十月份开始，而到了河上封冻的严冬，踢球的地地点就改在了冰面，所踢的石球也改成了铁球，“恒于冬月，冰上逐之”。进行这项运动的目的，除了有趣外，更多的是为了驱寒健身，“盖京师多寒，足指痠冻，儿童踢弄之，足以活血御寒”。

（据《北京晚报》）